

一位院士与一个山区县的吨粮梦

本报记者 余英茂 实习生 郭露



袁隆平(左三)与省市领导在商城田间验收

9月17日,来自商城县的一把金灿灿的稻穗被摆上了中国科协十周年会信阳展厅第一展台,一拨又一拨的院士、专家在展台前驻足、合影,有人还指着谷穗说:“看,那就是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

就在今年9月1日,袁隆平出现在河南商城县的稻田里,对这里种植的超级杂交稻赞不绝口,使得这个山区小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个山区小县,为何能够吸引享誉全球、惜时如金的袁隆平呢?追寻着袁老的足迹,记者奔赴商城寻找答案。

金秋九月,秋风送爽,稻花飘香,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籽粒饱满的稻穗随着微风轻轻荡漾,农民兄弟正在喜悦中收获沉甸甸的谷穗,累累硕果有力地宣告了“中国饥饿论”的破灭。

“米菩萨”的“禾下乘凉梦”

“袁隆平”这个名字,可以说和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吃饭问题紧紧地连在一起。

1960年,大饥荒席卷中国大地,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的袁隆平也同样饱尝了饥饿的滋味。

后来被中国农民誉为“米菩萨”的袁隆平,曾经做过一个“禾下乘凉梦”：“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它能够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利用杂种优势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一直是各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964年,袁隆平在我国率先开展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孜孜以求,他在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培育出了被誉为“东方魔稻”的杂交水稻,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也为全世界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高产攻关有了重大突破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商城县,境内河渠纵横,梯田层叠,嘉禾千顷,林茂粮丰,水稻是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被誉为豫南“鱼米之乡”。商城县农业局局长朱卫东告诉记者,该县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是生态气候适宜的水稻高产区。近年来,商城县向科技要产量,大力推广超级杂交稻,水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增长,由粮食自给自足转向对外提供商品粮,被农业部列入全国150个水稻高产创建示范县行列。

人们常说,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2006年,商城县国有农场试种的6亩超级杂交稻品种“Y两优1号”,亩产突破912.46公斤,刷新了单季中粒超级杂交稻单产最高纪录。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这个消息,豫南小县商城的名字,从此走进了现任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的脑海,再也挥之不去。

2007年3月10日,受袁隆平邀请,商城县副县长周天明前往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做客。袁隆平亲切地接见了周天明一行,详细询问了商城县的超级杂交稻推广种植情况。

就在这次会见中,袁隆平郑重地将超级杂交稻“Y两优1号”高产攻关任务交给了商城县。

按照业界惯例,水稻新品种培育成功后,要进行大面积种植示范,以测验产量,以100亩的平均产量为准。面积越大,产量会相应的降低。全国一共安排了18个“Y两优1号”示范片,商城县核心攻关区的面积为102亩,产量目标900公斤以上,是面积最大、产量要求最高的示范片。

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邓启云教授深知商城县所承担的任务之重,在会见周天明时,他神情庄重地说:“我们把‘宝’押在商城,希望商城县科学安排,不辜负袁院士的厚望。”

接受示范任务后,商城县再次让袁隆平大喜过望。当年9月6日,经专家实地测产,商城县“Y两优1号”亩产达859.4公斤。

得知验收结果,袁隆平兴奋不已:“全国其他地方还没有达到这个产量,这是超级杂交稻生产的重大突破!”

袁隆平(左三)与省市领导在商城田间验收

袁隆平(左三)与省市领导在商城田间验收

袁隆平(左三)与省市领导在商城田间验收



丰收在望

袁隆平(左三)与省市领导在商城田间验收

通农民,全县上下都行动起来,志在必胜。

在商城县,有这样一帮人,他们身先士卒,深入到超级杂交稻生产一线,筹资、抓督查、搞协调,亲自落实每一个环节,为超级杂交稻高产攻关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在水稻秧播的关键环节,田间地头总能看到商城县委、县政府领导们的身影,他们多次在稻田里现场办公,解决具体问题。在袁隆平的亲自过问下,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从捉襟见肘的财政资金中筹措了60万元,购进3万斤“Y两优1号”种子,无偿发给农民。

有这样一个人,几十年来,他潜心研究水稻栽培管理技术,一次又一次地树立了商城县水稻栽培史上醒目的标杆,他就是该县科技拔尖人才刘仲道。这位68岁的高级农艺师退休后老当益壮,带头在县农场开展高产攻关,博得了与其名谐音的“种稻”的雅号。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正值壮年,为了超级杂交稻的丰产,默默挥洒青春和汗水,他们就是商城县的农业技术人员。

忙碌的三月,播种的四月,农艺师胡敬东、江乃福、李伟、姚懿等人把水稻栽培管理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形成了“做给农民看、教会农民干”的田间课堂。从管农业的乡镇长、村支书到普通农户,技术人员开展多层次技术培训,并长期提供技术跟踪服务。县农业局还在县电视台黄金时间开办《科技园地》节目,使超级杂交稻栽培管理技术家喻户晓。

农业部门更是全力服务超级杂交稻生产。在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商城县却出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水稻病虫害苗头,遭遇洪涝、

袁隆平(左三)与省市领导在商城田间验收

新闻时评

新的改革攻坚从农村再出发

30年前,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第一步发轫于农村。安徽凤阳小岗村大胆尝试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不但发展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而且成了当时“解放思想”的一次垂范。当年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中国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30年后,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一次,人们的眼光又将投向农村。

从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改革已经初步适应思想解放与制度突破的历史需要,一些深层次的结构矛盾日益显现并继续得到重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突出,无法适应构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紧迫要求;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仍未完全建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这些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但源于制度性的弊端,而且源于中国人千百年的观念,还来源于日益紧密的全球化趋势。三者相叠加,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策中,解决矛盾、保障改革深化的意图十分明显。

三中全会中明,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全会因此强调,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新形势下,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农村改革成败事关中国改革成败。中国农村关系着全中国的粮食安全、土地政策,农村还是最庞大的劳动力基础。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不仅代表了本民族的文明程度,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而要在2020年实现全国居民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关键还是看农民收入这块“短板”能否提高。

而今,农村无疑成为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一旦获得新政,农村的发展势头将锐不可当。过去30年,以出台10份“一号文件”为标志,中国的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而接下来,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正如全会强调指出的,要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这对从整体上消除农村贫困,意义重大。

事实上,通过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不断尝试,改革的最终方向已经明确,那就是:不是“取”,而是“予”。即此全会强调的: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等。

改革越进入“深水区”,越需要勇气和智慧。当年的小岗村改革之所以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就在于他们的“首创精神”。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包括农村改革,就是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事实上,在中国广阔的田野上,有着农民丰富的创新能力和坚持不懈的毅力。尊重他们的创造,保障农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农村改革才能取得强大的动力。

30年不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轮回,对中国来说,一场转型既是盛大的典礼,又是艰难的生产。但是,30年的时间却让我们逐渐接近问题的核心。因此,30年后,我们再次关注农村,并从这里开始新一轮改革的攻坚。而最终的获益者,将不分城乡,不论地域,属于中国的每一个人。 欣一静

权力须止步于公民的精神城堡

重庆合川区40岁的唐尚海在渝中区大肆购买了一部二手手机,不料手机里面存有一段黄色录像。今年9月18日,唐尚海和朋友陈海军坐火车到怀化。一名乘警查票时擅自打开唐的手机发现了这段黄色录像,遂以唐尚海传播淫秽录像为由,罚款200元。

这位乘警目的是查票,但他却让旅客将“车票、钱包、手机”都让他检查,并且,他还“擅自打开手机,熟练地查看各项功能”。在违法执法中,乘警终于“发现手机里居然存了一段黄色录像”,然后,以唐尚海传播淫秽录像为由,罚款200元。

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公民的手机显然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不仅如此,公民的手机还具有公民住宅的意义。公民住宅是公民的身体居住的地方,是公民身体安身立命的空间,正因为公民住宅是如此重要,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刑法对于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罪名。在西方国家,每个公民的住宅就是公民的城堡,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千军万马不能进”的神圣领域。而手机、电脑等等公民私有财产,是公民精神居住的地方,收藏着公民的电话、私人记事、各种娱乐爱好等等个人信息,是公民精神安身立命的空间,是公民的精神城堡,同样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千军万马不能进”。

但是,“国王的千军万马”攻不破的地方,却沦陷在一个铁路乘警手中。乘警可以毫无依据地让公民交出“精神城堡”。更可笑的是,乘警擅自闯入“精神城堡”,偷出公民秘不传人的一段淫秽录像作为炫耀的战果,并以此进行处罚,程序违法在先,这算什么执法?就像某地的市民从网上下载一段淫秽录像在自己家电脑观看,他们没有传播,警察凭什么来处罚公民呢? 杨涛

北京交通广播电台知名主持人李洋、李莉和同事在完成荷兰的采访任务后,结伴自费到捷克旅游,因在布拉格一家外店兑换外币引起分歧,他们被多名捷克警察铐上手铐,在中国大使馆解救下,才重获自由。(10月12日中新网)

报道说,主持人们兑换外币后,发现价格不合理,提出交涉,店员置之不理,接下来的记述很耐人寻味:“主持人们忍无可忍,用手敲击柜前的玻璃,大声呼叫,情急中更有人顺手拿起放在台面上的银行卡密码输入器拍打”。

报道显示,有人把银行卡密码输入器都拍坏了——这需要多大的力气?一边大声呼叫,一边用力拍打,又是一幅多么“彪悍”的场景。交易时出现分歧,应该寻求正当的投诉与解决渠道才是;而当捷克警察出现时,主持人们又犯了一个更愚蠢的错误:既拒绝出示护照,也拒绝去警察局。凡此种种,捷克警察无疑可解读为:一群身份不明的异国人在无理滋事——在此之下,铐手铐也许不合法,但不违情理。

兴冲冲前来旅游的主持人们,想必没有滋事的主观故意,只能解释为:在国内,“知名主持人”这个特殊标签,养成她们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别人都得宠着、让着她们。现实中,警察执法碰到“知名主持人”时,往往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只是,这一次她们忘了自己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捷克。

在这里,我无意替捷克警察辩解。只是觉得,对于“中国游客海外遭不公平待遇”这样一个命题,具体在个体事件上,我们应该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动辄上升到“民族问题”的高度,让狭隘的民族情绪脱离事实真相走向泛滥——这无益于中国游客海外权益的保障,更无益于中国游客海外形象的塑造。

李洋等主持人异口同声谴责捷克警察的粗暴,我觉得,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只有当自己足够文明时,才能占据道德高地谴责别人与别国的不文明。不然,这种谴责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或是对自身错误的一种掩饰。

进而言之,李洋等主持人肯定会因这几个粗暴的捷克警察,而对捷克人的整体形象产生不良的观感。但要知道,捷克警察又何尝不会误以为李洋等人的作为,就是全体中国人的作为,从而误读中国人的形象呢?这值得我们反思。 修仰峰



担心银行破产,西方居民抢购保险柜。唐志顺画



工资物价图

谁会拿枪逼着宋丹丹上春晚?

近日,宋丹丹在接受采访时铁了心地表示坚决不上春晚。多少艺人哭着喊着要上春晚,为了上春晚想尽了千方百计。可人家宋丹丹说了,除非被枪逼着,否则坚决不上春晚!啥叫大腕?啥叫高人?啥叫不胜利?啥叫成功?这就是。

宋丹丹不愿上春晚,一是累,二是压力大,三是对已经功成名就的她而言,春晚这个大台子早已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了。其实,宋丹丹决不上春晚是件大好事,这些年来春晚一年不如一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熟面孔太多,年年都是那几个人在上面晃悠,观众不腻味才怪呢。

熟面孔自动退出春晚,给新人创造了机会,也符合观众的利益。因此,我绝对是不会“拿枪逼着宋丹丹上春晚”的,很多观众估计都不会。那么,假如真会有“拿枪逼着宋丹丹上春晚”的人,最有可能谁呢?我估计有两种人:其一,是广告商。这几年,宋丹丹做了不少广告,打开电视就能看到。对广告商来说,代言人的知名度当然是越高越好。虽然春晚如今名声不好,但在提高艺人知名度方面还基本上是“无与伦比”的。请宋丹丹做广告的企业,肯定希望她年年上春晚,以提高人气,带动产品的宣传。

其二,是央视春晚的工作人员。

从这几年的春晚来看,春晚的工作人员已经江郎才尽了。也难怪,每年都在央视内部那几根葱里选拔,能有啥起色呢?这些人,既保守又胆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起用新人风险太大,打造新节目压力太大,他们既没有这个能力,更没有这个胆量。于是乎,年年拉着几个大腕上节目就成了最“稳妥”最安全的选择。

说实话,真的不想再在电视上看宋丹丹女士撇着个嘴说方言了,她自己也表达了不上春晚的坚定决心。希望某些人尤其是某些“利益集团”,就别试图去做人家的思想工作了,就放过宋丹丹吧,就放过观众吧。 乔志峰